

The Inner world of a Schola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On Deng Zhichen's Hermit Complex and Concern for the Real World

Zhou Jiming

Abstract: “Yi Min” (referred as the hermits in ancient China) is a group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who pursuit spiritual cleanliness. The ideal of “Yi Min” is to be free from the restrictions of external possessions, to avoid taking themselves as the means to achieve other purposes and to guard their moral and spiritual independence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dignity. Therefore, “Yi Min” does not serve the power and keeps away from the rich. Although the era with “Yi Min” is gone, its cultural concept has been rooted in the min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ng Zhicheng, a contemporary schola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s famous for his works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Qing Poetry Chronicle*,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a*, and *Complete Collection of Antique Notes*, etc.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a scholar with the clinging of “Yi Min” complex. In his dairy, he claimed himself to be a “Yi Min” and described himself as being “no interest in fame and fortune, never seeking for official position”. He praised the cultural deeds in the history like insisting one’s moral integrity and loyalty, and meanwhile he despised the deeds like being time-server and power-seeker or singing praises for bigwigs. His ideal character is that literati should be in poverty rather than pursuing power and influence, because being in poverty would help them to create master pieces, which is commendable and corre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ti-Japanese War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ng Zhicheng always practiced his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like being away from politics, fame and fortune, as well as escaping from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rols. Deng Zhicheng tried to detach himself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however, he couldn’t eliminate his care for this world. He warned himself not to get involved, but couldn’t help criticizing current affairs. He believed that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leads easily to shifting responsibilities onto other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vulgar words in current propaganda like “nao”, “gao”, “gan”, etc. and the government preferred to use “good harvest” or “great harvest” instead of “harvest”, “go all out” or “exert the utmost effort” instead of “go ahead”, and so on. He criticized the intellectuals who once followed the same path with him but then lost their dignities while pursuing fame and fortune after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academic ide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ways of doing things, he and Chen Yin-que were so much in tune that they presented to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another personal character and another spiritual world.

Keywords: Deng Zhicheng; “Yi Min”; solitude; fame and fortune; official rank

Author: Zhou Ji-ming earned his MA in History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7, and got the title of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rom the National Young and Middle-aged Experts” by Personnel Ministry in 1997.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09, he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of Hubei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Hubei University,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concurrently vice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His main interests are in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Study of the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ritical Biography of Ji Xiaolan*; *The Original Era: Study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Fluctuation and Conflict: Thoughts and Society i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Process*;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co-author); *Symposium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hief editor); *History of Hubei Culture* (chief editor), etc.

一位文史大家的內心世界

——《鄧之誠文史札記》中的逸與“逸”

周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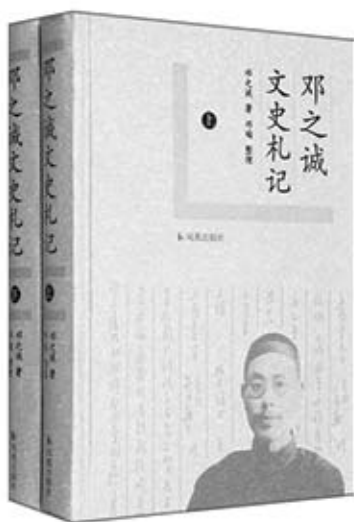
[摘要]逸民是中國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潔淨的一個群體。“逸民”與“遺民”的共通之處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兩者又有區別。遺民的核心文化特徵是，身處鼎革之際，深懷亡國悲憤和故國之思，念茲在茲。而“逸民”之“不事王侯”，與江山易代並無直接關係，更多的是繫於一種生存哲學與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種“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尊嚴。因此，逸民包含遺民，但遺民包含不了逸民。雖然逸民產生的時代早已消失，但其文化理念卻深深根植於文化人的心靈，成為中華文化的血肉。作為文史大家，鄧之誠以《清詩紀事初編》、《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全編》等著作而聞名學壇，但他同時又是一位有執著逸民情結的學者。他在日記中以“逸老”自許，自稱“生平淡於榮利，少無宦情”。他稱頌歷史上堅守節操和忠貞的文化行爲，鄙夷“奔走聲氣”、“因人而熱”。他明確揭示自己的人格理想：“文人宜窮，不宜達，窮而傳，乃至可貴，此則正論也。”從民國、日本侵華時期，到新中國建立後，他始終實踐他的遠離政治、遠離榮利原則，逃避政治統治與思想統治。但是，鄧之誠雖然努力逃避現實世界，卻又無法泯滅對這個世界的關懷。從已出版的《鄧之誠文史札記》來看，儘管他在日記中一再告誡自己少管閑事，卻又情不自禁對現實發表評論。他認為，集體領導制的弊端“難免不流為互相推諉”；批評在宣傳中動輒冠以“鬧”、“搞”、“幹”等粗俗字樣，乃至“豐收而曰大豐收、特大豐收。鼓勁而曰鼓足幹勁、鼓更足幹勁”，“唯恐辭之不費”；揶揄曾經與他同路的一些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追求榮利，有失節操。在文化精神層面上，他與陳寅恪若合符節、相互默契；但在諸多問題上，他又對陳寅恪不以為然。在鄧之誠日記中，展示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又一種人格精神和心靈世界。

[關鍵詞]鄧之誠 逸民 隱逸 榮利 功名

[作者簡介]周積明，1987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97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00—2008年擔任湖北大學副校長；現為湖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紀昀評傳》、《最初的紀元——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震盪與衝突——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潮與社會》、《中華文化史》（合撰），主編有《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文化史》等。

作為20世紀的文史大家，鄧之誠（字文如，1887—1960）以大著《清詩紀事初編》、《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全編》而揚名。雖然鄧之誠以學術名世，但學術並非他生命的全部。鄧之誠素有記日記的習慣，在日記中既記載了他買書、讀書、賣書以及師友往還、家居生活等日常瑣事，也記載了他讀書的心得感受以及對時政的感想。2010年，鄧之誠之子鄧瑞將1933年5月至1959年冬的鄧之誠日記加以整理，以《鄧之誠文史札記》之書名出版（見圖1）。這部文史札記，為人們打開了通往鄧之誠內心世界的一條通道。讀他的日記可以發現，在學術大家鄧之誠的思想深處，隱藏着深深的逸民情結，也同時充滿了“逸”與關懷現實的矛盾和衝突。

圖1 《鄧之誠文史札記》書影



逸民是中國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潔淨的一個群體。何晏（？—249）《論語集解》說：“逸民者，節行超逸也。”顏師古（581—645）《漢書注》說：“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程頤（1033—1107）對“逸民”的超逸行為方式有具體的描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①雖然在古代士人中，不乏以“逸”為文化資本，進而攫取社會資本、經濟資本者，但是，這些偽逸民，自盤算利益始，就已經不在逸民之列了。

在漢語詞彙中，有一個詞與“逸民”相關，這就是“遺民”。“逸民”與“遺民”的共通之處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兩者又有區別。清人歸莊（1613—1673）辨析說：“凡懷道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興廢之際。”“故遺民之稱，視其一時之去就，而不繫乎終生之顯晦。”^②清初，恽格（1633—1690）以山水、花卉之畫以及“善褚書”為“三絕”。鄧之誠評價說：“實則三絕中一點一滴，皆故國之思。非真識者不能辨也。若僅目為高逸，未免泯沒烈士苦心。”^③據歸莊、鄧之誠之言，遺民的核心文化特徵是，身處鼎革之際，深懷亡國悲憤和故國之思，念茲在茲。而“逸民”之“不事王侯”，與江山易代並無直接關係，更多的是繫於一種生存哲學與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種“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的尊嚴。因此，逸民包含遺民，但遺民包含不了逸民。

逸民的存在，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利慾世界裏保留了幾許道德與精神的亮色。清人王夫之（1619—1692）說：“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④又說：“逸民不樂在朝廷而輕爵祿，所以風示天下，使知富貴利達之外，有廉恥為重。”^⑤這就是逸民的文化價值。如果從古代士人與帝國政治統治的關係考量，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強權之下，“逸民”生活方式的選擇，又是一種逃避政治統治與思想統治，“孤行而無所待”的保持人格獨立、思想獨立的方式，正所謂“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⑥。借用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一句話，逸民生活方式是一種“逃避統治的藝術”^⑦。

①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周易上經下》，《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793頁。

② [清]歸莊：“歷代遺民錄”序，《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3。

③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恽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42頁。

④ [清]王夫之：《讀通鑿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624頁。

⑤ [清]王夫之：“周易內傳”，《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2011），第15冊，第193頁。

⑥ [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

⑦ [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二

在鄧之誠內心世界發現逸民情結，首先源於夫子自道。

1944年4月4日（農曆三月十二日），鄧之誠因日本朋友松崎鶴熊（1867—1949）堅請不已，“略敘生平不慕榮利及為學之方以答之”。在自敘中，鄧之誠談及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與生活原則：

生平淡於榮利，少無宦情。辛亥以還，默察宇內將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未嘗露一命之榮，食半鍾之祿。中間丁巳受聘國史編纂處纂輯，以為載筆之事，無異授徒。三十年來，喪亂之間，亦嘗為之排難解紛，然慕魯仲連之為人，終無所取，仍為大學教授也。志在山林，所以不即遁迹者，以無山可隱，兼寒家食指衆多，無所得食，又諸生相從甚殷，義不忍捨去故也。使不爾者，不為皋橋質廡，亦當因樹為屋久矣。^①

這是一篇很“逸民”的自述。

大致說來，“逸民文化”有兩大要素：一是不仕。鄧之誠為了維持家庭生計，不得不擔任教職，但在他看來，教職和出仕絕不是一回事。自己雖於丁巳（1917）“受聘國史編纂處纂輯”，亦屬於載筆之事，“無異授徒”，與出仕無關。他自述“未嘗露一命之榮，食半鍾之祿”，絕意仕進，對於體制與政治高度疏離，“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二是輕爵祿、遠聲利。清人孫奇逢（1585—1675）說：“士必先遺聲利而後能逸。”^②鄧之誠自稱“淡於榮利”，“不求聞達”，“志在山林”，正是“遺”富貴利達而“逸其心”。

在上述自述中，鄧之誠引用了兩個逸民文化的典故：“皋橋質廡”、“因樹為屋”。“皋橋質廡”典出《後漢書·梁鴻傳》：梁鴻攜妻孟光隱居避患，“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後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因樹為屋”典出《後漢書·申屠蟠傳》，申屠蟠“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朝廷屢徵不就。後避黨錮之禍，“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以這樣兩則典故表述自己的情懷，以及無意仕進的原因，呈現出來的是鄧之誠對逸民文化的身份認同。

“避世”、“隱逸”的情結，使鄧之誠對明清鼎革留給清初的重要文化遺產——明遺民特別關注。

鄧之誠對明遺民的最初關注始於“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這一關注和研究，持續了二十多年。1959年，亦即鄧之誠辭世的前一年，他終於完成了中歲以後傾注大量心血的《清詩紀事初編》。這部堪稱鄧之誠代表作的大著，本黃宗羲（1610—1695）以詩證史之說，以詩存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更特別關注那些“崎嶇兵革之間，呻吟鞭撻之下，艱於一飽，動觸網羅，寄其抑陶，行歌相答”的“草野之士”，稱他們的詩作“山河有淚，花鳥添悲”；發掘鼎革之際隱身避地、事迹湮沒，唯在同時詩人吟詠中驚鴻一現的遺民志士，白其事，表其功，彰其志。王汎森曾批評說：“鄧先生學問那麼大，可是受他所關心的問題頗有限制，他對明遺民的興趣太大，所以，明遺民世界中非常小的事情他都要講。”^③他沒能理解的是，鄧之誠對遺民文化的關注，是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也是對自我的精神肯定。他為那些湮沒於歷史深處的遺民志士而哭，正是因為在他們之間有一條同呼吸的情感紐帶。

在挖掘明遺民的事跡並加以表彰的同時，鄧之誠特別注意辨別“偽遺民”與“真遺民”。早在清初，萬斯同（1638—1702）曾對《宋遺民廣錄》中所收錄記載的遺民加以清理：“何宗，《元史》入《隱逸傳》，然嘗仕元為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又行省聘為龍興郡學師，非遺民。

① 《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上冊，第253頁。文中所引鄧之誠日記均出自該書，不再詳註。

② [清]孫奇逢：“李逸士傳”，《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5。

③ 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經驗談”，《何謂現代，誰之中國：現代中國的再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文及翁爲僉書樞密院事，聞元兵逼江南，諷臺臣劾己，章未上，先出關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稱遺民？趙潛爲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棄城遁。此誤國之賊，安得稱遺民？趙復，雖未受元職，然其教大行於北方，日主講席，終於燕都，非隱士也，亦不當入。”^①鄧之誠評述說：“季野《宋遺民廣錄訂誤》考訂精核，義正辭嚴”，“誠不苟之作”。他又進而揭示：萬斯同之所以考訂《宋遺民廣錄》，“蓋爲順康時冒稱遺老者而發”，“馳驚聲華者，可以悚然矣”。

接續萬斯同的思路，鄧之誠亦對清初的明遺民加以評判。

1942年10月9日（農曆八月三十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議論說：

晚近以來，不爲異姓之臣者，多幽棲岩穴，肥遁自甘，甚或託迹黃冠，逃之縉素。於是忠義隱逸，儼然媲美，修名所在，塗飾因之。

所謂“忠義隱逸”，成了取譽當世的文化符號。他進而辨析道：

明清之際，如牧齋顧惜身家，委質恐後，而筆投江上，簽進越中。以云兩端，誠哉首鼠。梅村草間偷活，悔恨自擗，發爲韻歌，熱血耿耿，雖迫哀親，胡捐鬻釜。又如梨洲乞師海外，作註西台，而遺子百家，明夷待訪，保身則哲，求志或孤，以視荃化爲茅，雀飛成蛤者，固當有間。而揆以貞一，詎曰有合？

1954年1月13日（農曆臘月初九日），鄧之誠又在日記中議論說：

嘗論唐以後無真隱，如以皮、陸充隱，則賀監亦高尚其事者矣！不特種明逸可議，即明復、康節，豈足以當高逸！近人王壬翁亦其類也。隱，當去姓名，安可倚達官、顯宦爲重哉！在這兩則日記中，鄧之誠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樣的行爲方式可以稱爲高逸，可以稱爲隱士？在他看來，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1）、黃宗羲，或是首鼠兩端，或是草間偷活，或是晚節可議，不合高逸的“貞一”精神；皮日休（約838—約883）、陸龜蒙（？—881）、種放（955—1015）、孫復（992—1057）、邵雍（1011—1077）、王闖運（1833—1916），皆有出仕或依附權勢的情節，亦不可稱爲真隱。既是隱逸，就應當絕去仕途、權勢、榮利，堅貞如一。這大抵就是鄧之誠心目中的隱逸的原則和標準。1959年1月4日（農曆冬月二十五日）鄧之誠爲清初詞人彭孫通（1631—1700）“草小傳一首”，竟發現“無事可記”，因此感歎說：“不知此君晚年何以寂寞若是，可以知其爲自好之士也。”在《桑園讀書志》中，他評論《變雅堂集》的作者杜濬（1611—1687），雖“伏處江介，窮餓自甘”，卻又“不免奔走聲氣”，尤其是與“時方向用”的熊賜履（1635—1709）交往，“雖曰同里之契，氣味相投，然因人而熱，豈草衣卉服之所宜乎。蓋好名之累，與岩穴幽棲之士，頗異其趣矣”。在鄧之誠心目中，“寂寞”意味着“自好”，而“奔走聲氣”、“因人而熱”，與隱逸隱世是全然背道而馳的。

鄧之誠視野關懷下的遺民，不僅是明遺民，而且包括清遺民。

1942年10月9日（農曆八月三十日），鄧之誠爲王季烈撰“七十壽序”。王季烈（1873—1952），字君九，別號鱗廬，江蘇長洲人，是近代與王國維（1877—1927）、吳梅（1884—1939）齊名的曲學大師。唯王季烈因排斥民國政體，竟至參與清室復辟，並於1932年3月隨溥儀（1906—1967）赴長春，與佟濟煦、寶熙、鄭泉、林榮、金卓、金賢、胡嗣瑗同列“內務大臣”。雖然1934年春，王季烈便上奏乞歸，但因此兩年之經歷，其人其事遂被湮沒。

清人陳康祺（1840—1890）《郎潛紀聞》說：“壽序諛詞，自前明歸震川始入文稿。”之所以稱爲“諛詞”，是因爲當壽辰之時，以嘉美之詞譽之、祝之，乃人之常情。故祝壽之文，“罕有不溢美者”。然而，鄧之誠的這篇壽序，僅以三十餘字表達賀壽之意，曰：“年秋九，君九先生七十有慶，飲和納粹，邀天之賜。唯介能和，期頤可待，國賴老成，未爲晚遇。”而接下來的主要內容，一是追溯《後漢書》以來爲逸民立傳之傳統；二是對明遺民中的錢謙益、吳偉業、黃宗羲加以評判，稱他們在明清鼎革之際，大節有虧，未能做到“貞一”。作爲與錢謙益、吳偉業、

①〔清〕萬斯同：《宋遺民廣錄訂誤》，《石園文集》（上海：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1935），卷8。

黃宗羲的對照，鄧之誠對顧炎武（1613—1682，號亭林）、陳榮昌（1860—1935）加以盛讚。

鄧之誠最欽佩的是顧炎武。早在1944年答松崎的自敘中，鄧之誠便自述：“為學之方，尊服亭林”。而在這篇“壽序”中，他對顧炎武的精神更加以表彰：

至若亭林生長江南，安於塞北，周歷邊陲，存問老兵，出入交山，親為籌策，身危心苦，垂老不休。迨玄黃既判，猶欲交天下之士，觀天下之變，世徒以逸遺目之，亭林不任受也。

不以顧炎武為逸遺，是鄧之誠一以貫之的觀點。《清詩紀事初編·顧炎武》稱：“炎武始終不忘恢復。潘耒贈炎武六十壽序，言事功不成當以著述傳世，可謂不知炎武者。”^①1954年1月13日，鄧之誠在日記中再次議論說：“亭林則志在有為，不能以隱目之。”鄧之誠之所以再三稱頌顧炎武，是因為顧炎武於江山易代後不是消極隱遁，也不是首鼠兩端，而是貞一不二，積極有為。

除顧炎武外，鄧之誠心服的就是“昆明陳侍講小圃”，也是他在“壽序”中着重肯定的第二位人物。陳榮昌，字筱（小）圃，號虛齋，又號鐵人、困叟，別號遜農、桐村，雲南昆明人。清光緒九年（1883）進士，授編修，督學貴州；二十年（1894），返昆明；二十二年（1896），受巡撫松藩之請主講經正書院；二十八年（1902），任雲南高等學堂總教習；後遷任山東提學使。宣統三年（1911），清室傾覆，民國肇始，陳榮昌決意隱居，在致山東周都督信中言：“今世界公論分君國而二之，洵有至理，特榮昌所處實難耳，既為清吏不敢背清朝，既生中土不敢忘中國，若清亡則終身為民不復言仕，諸君子當見而諒之矣！今民國已成，是即榮昌終身為民不復言仕之秋也。”^②鼎革後，陳榮昌退隱昆明安寧的鳴矣河，改“鳴矣河”為“明夷河”，蓋以《易經》卦取名，寓韜晦柔順之意；自號“明夷子”，不再出仕，“如禮學館之徵聘，清史館之纂修，圖書館通志館長，皆拒”。其門生秦光玉（1869—1948）稱：“其高風亮節，方之古人，雖後漢之管幼安、東晉之陶元亮，不為過也。”^③

鄧之誠論陳榮昌，補充了大量他隱居生活的細節以及隨從王君九參與復辟的情節：

三十年來……之誠獨心服昆明陳侍講小圃。焚棄筆硯，遁居安寧，河號明夷，志甘飢餓。坐臥小樓，絕口世事。世亦幾忘之。或尊之以遺老，輒便泫然。晚始奉手君九先生，服疇津洽，避地遼東，復夏宗周，策畫靡間，不務表暴，不居品目。

為此，鄧之誠評價陳榮昌“比迹亭林，後先接軌”，“可謂艱難有濟，終始不渝者”，誠為盛譽。

王君九、陳榮昌均係清遺民，甚至參與復辟清室乃至偽滿洲國的活動，鄧之誠卻與他們交好，並對陳榮昌加以盛讚。那麼，鄧之誠對於清室究竟是什麼立場？

據鄧嗣禹（1905—1988）、周一良（1913—2001）、王鍾翰（1913—2007）的《鄧之誠先生評傳》，年輕時的鄧之誠十分活躍，“對其時從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人的地下活動，先生均解囊相助，有時還為掩護革命志士逃脫虎口而甘冒風險。辛亥革命前夕，先生亦挺身而出，與同班學友李印泉、邵次明、李西原等多人，為加速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動，不辭辛苦，四處奔波，幾達一年之久。即在武昌起義以後，先生仍兼報社工作，撰寫過多篇政治性文章，高聲歡呼辛亥革命，熱忱不懈”。鄧嗣禹、周一良、王鍾翰是鄧之誠的門生，所言先生之生平不應有錯。而鄧之誠對清政府的印象也可見其日記。

1958年4月25日（農曆三月初七日），鄧之誠閱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在日記中議論說：“清室自取危亡，已至不可終日，一旦禍發，決難挽救。”

1959年9月11日（農曆八月初九日），鄧之誠在日記中寫道：“偶與二弟談及清季有人撰聯以譏政府者，曰：‘發奮為雌，勵精圖亂；破格用己，下詔罪人。’辛亥武昌起義，不三月而清

①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顧炎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② 陳榮昌：“復山東周都督書”，《虛齋文集》（昆明：雲南省圖書館藏），第51頁。

③ 秦光玉：“陳小圃先生傳”，《滇南名宦傳》（昆明：雲南省圖書館藏）。

亡者，人心久失，即此一聯，可以盡之，為之慨歎不已。”

由此而體味鄧之誠為王君九撰寫的壽詞，當知鄧之誠彰揚的不是王君九、陳榮昌復辟清室的具體活動，而是一種超越政治行為的節操和忠貞。誠如鄧之誠在“壽序”末端所申明的：“之誠仰苛禮接，不習頌言，因推往事，以明所志，雖未足為介壽之辭，然貞幹之義，或有發明，修辭立誠，庶無多讓云爾。”發明“貞幹之義”，“以明所志”，正是鄧之誠寫這篇壽序的主旨。

三

鄧之誠不僅內心深懷逸民情結，而且終其一生，遠離政治，不慕榮利，踐行逸民精神。

1933年9月25日（農曆八月初六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記載：“沈燮若來長談。此君近入蔣幕，謂已力倡予之美於蔣，力勸赴廬山一談，笑謝之。今之人如何可談乎。”

1937年7月7日（農曆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旋即佔領北平。身陷淪陷區，如何去就，如何存身，鄧之誠從明清鼎革時的明遺民身上汲取力量。他在《清詩紀事初編序》中自敘：“丁丑之秋，遭逢變亂。念明清之際，先民處境，有同於我者，不識何以應變，乃取其詩時時觀之。欽其節操，爰患中賴以自壯焉。”^①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佔，鄧之誠與張東蓀（1886—1973）、洪煥蓮（1893—1980）等燕京大學的教授被日本軍逮捕入獄，雖備受虐待凌辱，但大義凜然。次年出獄後，鄧之誠一再峻拒出任偽職。1943年6月24日（農曆五月二十二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記載：“孫宣來，代周作人致意，約為綜合研究員，可以不到院，在家自由研究。仍以年老，須自成書，峻卻之。孫宣又以委託研究見商，亦笑謝之。”同年，鄧之誠的日本友人松崎欲薦他為山西《新民報》主筆，年有萬金，鄧之誠辭之，8月29日（農曆七月二十九日）在日記中記：“得松崎二十一日書，言予不就報館事，深悔知我之淺，益慕予之。”

沈燮若欲薦鄧做蔣介石幕僚的1933年（民國22年），鄧之誠生活窘迫。是年6月28日（農曆閏五月初六日）記曰：“困難甚多，如此間債務，如移家費用，尚皆無出，因致進退維谷。”次日又記：“連日籌維無術，以月得二百四十，僅敷日食。兒女輩學費及所負債皆無應付之法。內子不諒，催嫁貞女甚力，真令人束手。”1943年，拒絕周作人與松崎之聘的鄧之誠仍然深陷困境。5月3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鄧之誠因糧價大漲，“為之不樂，占二絕句：生計蕭疏一飽難，妻兒相對涕洟瀾。回思艱棘銀鏹日，細雨愁風一樣酸。”8月18日（農曆七月十八日），又作《桑園往事》分致友人，其中有詩句云：“人間萬事書應備，祇少仙人辟穀方。”困窘之下，鄧之誠唯有靠賣書和傢具或典當、借貸以及戚友學生的接濟度日，偶而刻印鬻字以得微資，十餘口之家僅免於凍餒。在艱難困頓的處境下，鄧之誠拒不接受上廬山接近蔣介石的機會，又峻卻周作人之請，辭謝松崎“年有萬金”之薦，實是因有逸民理念與遺民節操作為強大的支撐。

1949年，江山易幟，鄧之誠開始面對一個全新的政權。可以肯定的是，鄧之誠對於國民黨政權是深感失望的。1948年5月20日（農曆四月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校中今日放假，以蔣中正就職大總統也。自民十三(年)以後，久無此稱矣，今又有之，令人感慨無窮。南京學生全體罷課一日，以紀念去年今日慘案為名，實即對蔣新職表示反抗也。耳目所及且如此，尚何論遠方乎？蔣之不振，即此可以知之，特竊美號自娛耳！

1948年7月24日（農曆六月十八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記其時之戰事並加評論：

前數日，襄陽陷落，康澤被俘。徐溝、太谷之戰，趙承綬被俘，歷來共軍能俘國軍高級將領，而國軍不能，勝敗之數，已於此可見矣。聞康澤在共軍未圍城之前，往南京領餉萬億，在上海倒把，致物價大漲。蔣中正命其子經國查辦，經國素與康澤不協，立將其金資及貨物扣留。康本意乘船載貨至襄陽販賣，至是乃空手歸。值戰事起，無以發餉，其下竟縛之

^①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序》，第1頁。

獻敵。此輩不自知死期，尚贖貨若此，蔣所部皆贖貨，安得不敗？

同年9月3日（農曆八月初一日）又記：“言蔣夜間無人時常痛哭，知其處境之苦。然天下事豈一哭所能救耶！”1949年12月10日（農曆十月二十一日）再記：“蔣於今晚八時，踉蹌抵臺北。成都危在旦夕，昆明有已易幟之說，大勢已定，正若戲臺已吹喇叭散戲，雖欲續演不可得矣！”

對於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鄧之誠是頗有讚歎的。1950年4月8日（農曆二月二十二日），他作《劉仙洲造像記》，文中稱：

今日科學日新，機械百出，農之進也，一日千里萬里，而我猶封於故步，胼手胝足，與機械爭勝負，人居十百，我僅一之。不農則不食，不食則不國。故資於農之進，以資工與商可也。而其始在利農器。政府草創萬端，而有華北農業機械總廠之設，可謂知所先務矣！……予維數十年以來，舉國號呼，倡為維新，曰改革，曰建設，而其效不彰者，農國也。農產不給，而侈談工商，且侈談整軍經武，是謂先後失次。專門名家多矣，而惜其不用，或不竟其用，是謂沮抑人才。今觀於華北農業機械總廠一年之生效，知其事易舉也……而後歎數十年來，尸大位者之罪通於天也。……吾雖老，猶得規國之興焉！

1953年7月1日（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在日記中寫道：

報載：永定河官廳水庫六月二十九日完工，壩高三十五公尺，湖（水庫）廣二百三十平方公里，役工四萬人，為時一年又八閱月。治淮、荊江分洪及此，皆以今年竣工，非共產黨無此氣魄，亦無此力量。

1954年1月11日（農曆臘月初七日），翻閱《點石齋畫報》時記曰：“起光緒十年（1884）甲申，迄二十三年（1897）丁酉，足以見彼時社會腐舊狀況，以視今日，不可謂非進步矣！”4月16日（農曆三月十四日）晨八時，“冒雨至小廟投票”，參加普選；晚上，在日記中記載：

成府北區今日投票者千二百人，自晨八時至夜十一時，執事者、秧歌隊腰鼓隊之巡迴者，始終不懈，不疲，使人能盡其力若此，有生以來所未見也，如善保持之，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竟乎！

1956年2月16日（農曆正月初五日）記：“王希翰來，言：墨石口挖河業已開工，將來引官廳水庫之水入護城河，再開新河以達天津行輪船，殆將復禹之績，覺金、元水利藐乎小矣，科學之為用大矣！”

但是，鄧之誠對政治的疏離和回避，未曾有絲毫淡化。1950年10月17日（農曆九月七日），他在日記中記道：“科學院硬派我做歷史考古專門委員。”兩天後，他“與東蓀言及專門委員事，東蓀以為不應辭，辭則得罪人也”，可見他當時是意欲辭去。1951年2月20日（農曆正月十五日）記：“定於星期六、日，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開會。即復一字允之，但推病不到會。”7月26日（農曆六月二十三日）記：“得北京大學洪楊史料編纂會通知：明日開會，附金毓黻書勸駕。擬皆不往，珂兒以為太過。此子不知我心，然能笑受，可以免於今之世矣！”9月13日（農曆八月十三日）記：“科學院開院務會議，以卡車來迎，辭以腰痛，未往。此又予一罪狀。”9月14日（農曆八月十四日）記：“校西門轉來昨日科學院開會通知：昨、今兩日，正、副院長報告，十七至十九為專題討論。不可怠慢，急作一書致鄭振鐸，言腰痛未能赴會。”1953年7月10日（農曆五月三十日）記：“致書科學院，星期之會請假不出席。”1956年6月10日（農曆五月初二日）記：“聞胡繩譽我，珂所聞亦然，我何必需此哉！”7月5日（農曆五月二十七日）記：“欲役我校訂《清史稿》，我豈其人哉！……那能隨便聽人擺佈。”

鄧之誠對政治採取如此決然態度，一方面基於他以往所持的逸民立場，另一方面亦與當時的政治生態密切相關。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鞏固政權基礎，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在接踵而來的各種運動中，鄧之誠昔日的一些朋友、熟人或被鎮壓，或自盡，或貧困而死，或因言獲咎，這對他內心產生的衝

擊是相當大的，因而在日記中有不少反映：

1951年3月5日（農曆正月二十八日）記：“張東蓀來，高名凱來，言陳寶琛之子幾士於二月一日在福州以地主惡霸罪名槍斃。”“並其管事僕一同槍決。”12月25日（農曆冬月二十七日）記：“下午，裴估來，言賀孔才以上星期一投北海死。此人為吳辟疆弟子。”賀曾為《民國日報·副刊》編輯，“公安局以賀必參預國民黨，不然不能薦多人入天津《民國日報》，因疑賀必與香港《民國日報》通消息，屢嚴詰之，賀遂於星一之夕，乘人靜，自團城緣所繫繩降落平地，手掌為繩所傷，步至橋頭，解衣投水，比人知往救，已久絕矣！”鄧之誠感歎說：“一說文化部於忠誠老實運動結束後，已批准重新登記，免於管制，已無事矣，豈又有新糾纏耶！”

1951年，張東蓀事件發生^①。鄧之誠與張東蓀交往密切，關係親近，其日記有多處與張東蓀往還之記載。此前的1950年3月2日（農曆正月十四日），鄧之誠因張東蓀參與北平和平解放和談，撰《北都圍城紀事四章贈張東蓀》，詩中謂：“戊子之冬，幽都罹兵，城守二十萬人，攻者或三倍之。百萬生靈不自意能全，謂將與宮闕文物同燼矣！東蓀徒步兩軍間得成和議，既許為文辭以張之，隔歲乃成此詩。”而自稱於北平和平解放有功，也正是張東蓀肇禍的原因之一。

1952年1月24日（農曆臘月二十八日）記：“校中開反浪費控訴大會。本定晨九時開會，以昨夕會至深夜，故改下午，首由陸志韋檢討，眾嫌太泛，令其下期再說。蔣蔭恩檢討，亦未得好評。繼由負責學生報告總務處及各部門貪污浪費各情。至此，即有人在人群中呼號嚴懲石文博、范玉華、王翰章者，旋令三人摘帽，摘校徽，俯首跪於臺上。後由雷潔瓊演說，搜出倉庫所藏美、英及國民黨旗幟之嚴重性，問陸、蔣知之否？遂散會。明日上午，各系繼續開會。下午，開展覽會，反動國旗及貪污浪費證件均須陳列。”陸志韋（1894—1970）曾任燕京大學校長，日本人佔領北平期間，曾與鄧之誠同被抓捕入獄。現遭遇如此下場，鄧之誠不免膽戰心驚，“今日之會，陸公受窘可謂至矣！”

1953年10月18日（農曆九月十一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梁漱溟在政協常委會上與周恩來（1898—1976）、毛澤東（1893—1976）圍繞總路綫的爭執。

1954年10月5日（農曆九月二十九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記：“晚，高名凱來，言：昨日北海之會，由《人民日報》鄧拓主持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無異鬥爭，竟日始罷。”

1955年7月8日（農曆五月十九日）在日記中記曰：“彭岳漁來，言：聶紺弩亦是胡風分子。胡風往來信件皆編號歸檔，其有組織可知。”

1957年，他的諸多朋友包括他最親近的弟子王鍾翰紛紛被打成右派。鄧之誠不能不為之驚悚。4月28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記：“今日報載：駁雷（海宗）及雷認錯之文，仍是禁止說話也。雷前年說：‘胡適亦有可取。’惹出麻煩不少，猶復饒舌何耶？”

1958年12月1日（農曆十月二十一日）記：“高名凱來，言：陳絮是聞將被列為右派，赴水得救，送瘋人院。陳鋈則於右派處理後，改任圖書館職務，每月須扣薪水六十元還債，因盜賣館中書籍，羞憤自縊死。今日消息隔絕，偶得一消息，皆出意料之外，可異也。喘脹大不適。”^②

面對高壓的政治氛圍以及世事的多變難料，鄧之誠一再告誡自己，慎言，少管閑事，遠離世務。1951年10月10日（農曆九月十日），賦詩《寶昌詩意憂鬱，以此廣之》，中有詩句：“學得逍遙新旨趣，心同（如）野鶴不同孤。”11月23日（農曆十月二十五日），作《近事有感》，中有詩句：“懸崖瀑響猿同嘯，下瀨船飛鳥共爭。世變紛紛到林壑，余將草芥比身輕。”“雲迷遠

① 1949年1月，張東蓀曾陪同傅作義的談判代表周北峰出城與解放軍天津前綫指揮部密談北平和平解放事宜，並作為雙方和談的見證人參與了談判。新中國建立後，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遂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解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更與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由此釀成“張東蓀出賣情報案”。

② 對於當時政治氣候下的種種傳聞，陳寅恪曾有“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的感受，錢鍾書亦有“座中變色休談虎”的詩句〔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第577頁〕，由此可以參照理解鄧之誠的心情。

岫峰峰變，風急孤帆面而爭。唯有道人無一事，羽衣原比五銖輕。”11月26日（農曆十月二十八日），作詩《卻酬李仲公》，中有詩句：“天意晦茫安可說，願留微命到升平。”1953年10月2日（農曆八月二十五日）記曰：“昨夕思得一義，世間萬事，即此已足，若再多求，必致殃咎。此之律己，非敢教人。”1954年1月25日（農曆臘月二十一日）記曰：“予老矣，飽食足睡，盡有世界，既可頤老，亦堪避俗，如尚多言，不啻自毀，默爾而息，庶享長年，老來作計，莫善於斯！”1955年9月7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記曰：“今後但閉門閉口，待盡之年，以不惹麻煩為第一義耳！”1956年7月5日（農曆五月二十七日）記曰：“少管閑事，多活幾年。”1959年9月25日（農曆八月二十三日）賦詩：“少日聲名每自矜，老來懷抱冷於冰。世間萬事吾無與，頑鈍方知是壽徵。年來多病閉柴關，一片孤雲時往還。若有半分哀樂意，定難閑坐看西山。”

鄧之誠立意避世，遠離政治，但是政治現實卻不允許他避世。當鄧之誠表示，因各種病痛不能參加學習，相關機構就把會議開到他家中：1951年10月13日（農曆九月十三日），“鍾翰來言：政治學習，已分小組，須至我處開會一二次”。1952年1月5日（農曆臘月初九日），“下午兩點，學習小組在我處開漫談會，談土地改革問題，六點畢會”。

學界對鄧之誠的各種嚴厲指責，也使得他倍感壓力。1950年元旦（農曆冬月十三日）記曰：“齊思和來，言翁獨健公開罵我‘倚老賣老，好批評人，什麼會都不去’。”對此，鄧之誠自嘲說：“此良言也，即以此罪名，勒令餓死，實不為枉。”1955年9月7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記曰：“徐蘋芳……謂聞之宿白，此次運動，陳仲夫自行檢討與同人團結是受我影響。衆遂指責我不應建立宗派。冤哉！我何嘗建立宗派耶！一生受宗派欺凌則有之，亦未嘗有計較心。人不相知，而有此疑，是則我之過也，於陳仲夫何尤！於衆人又何尤？”1959年9月26日（農曆八月二十四日）記曰：“許大齡在北大揚言我詆公社。憶數月前，彼來時，我無此語，不知何以誤會。是又一陳仲夫也，令人生懼。”

據王鍾翰回憶：20世紀50年代，鄧之誠對當時應接不暇的一場場政治運動反應消極，作冷眼觀，引起了某些學者的強烈不滿。一次，他陪鄧之誠參加由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召開的知識分子座談會。會上，翦伯贊（1898—1968）發言批評道：“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有人自恃有些舊學功底，就對抗思想改造。我奉勸某些人，不要自視過高。其實，過去的所謂‘國學’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在座者皆知其所指，而鄧之誠雙目緊閉，一言不發。“散會後，我送文如師回寓所，一路秋風蕭瑟，落葉滿階。師生二人比肩而行，皆默然無語。但我看到了文如師臉上的無奈、目中的茫然。”^①

儘管鄧之誠一再以“慎言”告誡自己，但頻繁的政治運動對他日常生活的干擾，使他很難一言不發，難免有“不諧”之詞流露，而身邊的朋友迫於各種壓力，紛紛前來進言、勸告：1951年12月4日（農曆冬月初六日）：“張東蓀、高名凱先後來，皆勸我學習，可感也。”12月15日（農曆冬月十七日）：“張東蓀來閑談，勸予參加小組討論。”1953年9月16日（農曆八月初九日）：“午，王劍英來……言：夏自強埋怨我不赴科學院開會，為辜負彼之好意。”1954年5月30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晚，招同舍來談，微箴予宜謹言，此良規也。”1955年9月7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徐蘋芳冒雨來……力勸我以後勿談政治、校事，以及生活問題。”1958年1月16日（農曆冬月二十七日）：“下午，李印泉來，久坐，言：今後三年世界上變故甚多，婉勸予勿多言取戾。告以金人三緘也。”1959年10月8日（農曆九月初七日）：“晚間，同舍(聶崇岐)來，力以‘難得糊塗’為言，知我之病，可謂良規。”

為了免禍自保，鄧之誠亦不能像以往那樣淡泊自如。1951年12月15日（農曆冬月十七日）：“晚，赴侯仁之家開會，所謂從諫如流也。”9月14日（農曆八月十四日）：“校西門轉來昨日科學院開會通知：昨、今兩日，正、副院長報告，十七至十九為專題討論。不可怠慢，

① 王鍾翰、邱永君：“王鍾翰先生訪談錄”，《民族學名家十人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第4—5頁。

急作一書致鄭振鐸，言腰痛未能赴會，並贈以庚子年美國佔領北京木刻告示一紙，冀其能緩我也。”9月24日（農曆八月二十四日）：“晨，以電話叩李仲公，託其致書郭沫若緩頰，以予此次未出席科學院院務會議，恐以不合作為咎也。”

但是，在鄧之誠的內心，逃避被統治的信念從未動搖。1953年9月16日（農曆八月初九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談到外間對他不參與政治學習的批評，寫下一行字：“今日所聞入耳、逆耳之言各半，唯有我行我素，免為患得患失之小人。”這可謂他堅守信念的內心獨白。

四

鄧之誠自從關注逸民和遺民文化以來，就把遠離宦場、遠離榮利作為自己持身的信念。新中國建立後，他仍然不斷地強調、強化自己的這一意識。

1950年6月2日（農曆四月十七日）鄧之誠閱《國(清)史列傳》，摘記周篈（1623—1687）、陳學洙事迹。周篈“會彝不置，走京師。訪之，居二年，未嘗一詣貴人。時徐乾學好士，篈同里徐善主其家，善與篈同臥起，乾學欲一見而不可得也”；“陳學洙，戊辰會試主司，徐乾學先期羅致諸名士，有友約學洙往會，行至中途，忽自念曰：吾生平未嘗有私請，中不中，命也，半世守節，老而失身，可乎？竟不往”。鄧之誠作案語曰：“乾學網羅人才，一時文士無不出其門，若篈與學洙，誠可謂自好之士已。周篈、陳學洙獨不附徐乾學。”“自好”與“獨不附徐”，可謂這段案語的關鍵詞。

1952年4月27日（農曆四月初四日），鄧之誠閱清初士人黃之雋（1668—1748）的《瘖堂集》，為繫一長跋。在長跋中，鄧之誠記敘黃之雋的事迹：“力辭律呂正義館幕修之徵，不詣朱邸……歸田後，家不中資，唯藏書二萬卷，後遂屢辭江寧鍾山書院、福州鼇峰書院、山陽淮陰書院、廣州粵秀書院、揚州安定書院之聘，固有所駭，而倔強忍饑，亦人所難也。”“之雋剛介不隨流俗，故宦不達。”讚許之情溢於言表。鄧之誠進而發揮，把“宦不達”的黃之雋與達官張照（1691—1745）比較。黃之雋於康熙朝“力辭律呂正義館幕修之徵”，張照則在乾隆朝以南閣學士身份，奉命續修《律呂正義後編》。鄧之誠對張照十分鄙視，在《骨董瑣記》中曾指斥“九卿中張照最鄙。撰進《法宮雅奏》、《九九大慶》、《勸善金科》、《升平寶筏》諸曲，尋聲度拍，親為樂操鼓，甚至獻身鬻鮓，蓋阮佃夫之流亞也”^①。在這篇長跋中，鄧之誠又譏諷說：“達如張照，在律呂正義館編曲操鼓，如狎客伶官，曾不得比於大晟樂府，身後籍沒，幾至族夷，亦何貴於達官乎？”^②“以是知之雋有品，不圖文士中尚有此人。”鄧之誠如此評論黃之雋與張照的史事，頌揚有品而不達的黃之雋，譏諷達而無品的張照，是對自身理念的進一步確認。

1953年9月28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日），鄧之誠在日記中再次談到“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問題：“翻閱《翁山文外》一過，知古今文人不出兩類：一為達而在上者，稱頌功德，鼓吹休明者是也；一為窮而在下者，憔悴憂傷，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與徐乾學、高士奇、張英相較，此義自明。今日非無翁山其人，無此才筆耳！……文人宜窮，不宜達，窮而傳，乃至可貴，此則正論也。”翁山，即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隱逸詩人屈大均（1630—1696）。鄧之誠以窮而在下的屈大均與達而在上的徐乾學（1631—1694）、高士奇（1644—1703）、張英（1637—1708）比較，宣示自己的價值選擇，其心志於此大明。

1953年11月13日（農曆十月初七日），鄧之誠“過孫楷第久談”，“談及二陳，予謂正賴此

① 鄧之誠：《骨董瑣記·乾隆諸相》（北京：中國書店，1996），卷3。

② 鄧之誠此處記憶有誤。據《滿漢名臣傳》，張照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因苗疆事入獄，乾隆元年九月五日出獄，乾隆六年十一月奉旨與莊親王允祿考察朝會樂章，請旨續纂《律呂正義》，獲允，協同允祿理其事。乾隆十年正月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敏。乾隆二十四年，“因查閱蔣洲署中所藏字跡書冊，見有張照獄中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又於張照之子張應田寓中查取張照所遺筆劄，則更有違禁之語。但乾隆帝基本上採取了庇護態度，認為“使張照仍在，即應治以國法，今其人已死，故免深究，伊子張應田所得蔭生官職亦從寬免其革退”。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御制懷舊詩，列張照於五詞臣中”。考其生平，並無“身後籍沒，幾至族夷”之情節。

輩為世人所重，我乃得為逸老耳”。二陳，即陳寅恪（1890—1969）、陳垣（1880—1971，字援庵）。“逸老”則是鄧之誠的自我定位。

然而，自稱“逸老”的鄧之誠並非真正的逃逸方外，內心中仍然強烈地關注着身邊的世界。

他關注1949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並情不自禁地發表感想和議論。1951年2月11日（農曆正月初六日）記：“宋毓珂來，言天津一夕之宴有費四百萬者。奢侈之風如疫癘，吾懼其蔓延也。”1953年11月26日（農曆十月二十日），鄧之誠閱報，對題為《認真貫徹集體領導制》的“社論”發表意見：

竊意互相監督，難免不流為互相推諉，且何者應由個人決定，何者應開會取決，亦難掌握也。辯證法本屬一種高深哲學，欲盡人靈活運用，本至難之事，毋過左過右即過猶不及，亦即所謂執兩用中，非聖人不能，今欲人人皆為聖人，可乎？此即今日思想癥結，一言以蔽之，即思想是否能聯繫事實，以主義為人民服務，此可以聯繫者也。辨別事之可行與否，舊社會一切事物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當去，何者當留？

1955年1月23日（農曆臘月三十日）記：“今年花爆聲似多於往年，幹部喜此也。”1957年4月28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記：“王鍾翰來……言：一般人對《人民日報》為雷海宗所作案語，多持異議。”1958年6月26日（農曆五月初十日）記：“報載：康生、陳伯達、周揚、于光遠皆兼任大學教授，北大前聘馮定為哲學教授，唯李□□以白蟻專家受聘中山，專則專矣，但恐講奉不能多耳！”1959年10月30日（農曆九月二十九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評論其時流行的革命話語說：

近來俗語常見於文字者，曰“鬧”。昔年鬧官派，鬧家務，鬧事，鬧大氣，鬧考，鬧風潮，鬧意見，皆非美辭，近唯鬧情緒一語，有不滿之意。餘凡宣傳事項，冠以“鬧”，或“大鬧”字樣，以見烈烈轟轟、熱熱鬧鬧之極況。蓋視大鬧天宮為革命行為脫化而來。次則曰“搞”，曰“幹”，本蜀語，流傳於黔、楚。昔有“為官不在大小，各人搞、幹不同”一語，謂其囁人行事也。今則作“操持”解。搞工作，搞運動，搞研究，搞對象。幹則有窮幹、苦幹、硬幹、單幹、大幹，至於巧幹、實幹，而愈綿密矣！

1959年11月3日（農曆十月初三日），繼續評論說：

昔人為文，唯恐辭費，故王壬翁述庾信《枯樹賦》，曰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事異時移，無端感慨，以“無端感慨”四字總括全篇，言有盡而意無窮。今則唯恐辭之不費，故豐收而曰大豐收、特大豐收。鼓勁而曰鼓足幹勁、鼓更足幹勁，言無窮而意有盡矣！雖文章有體，各示其宜。工農言語不得不爾，然士流獨當默爾而息乎？

1959年2月7日（農曆除夕）記曰：“一年以來，世變最多。所謂‘三可’。即毛公與康生商定之‘人可改造，事可多辦，錢可少花’。歲暮，物資缺乏，歷來罕有。”

鄧之誠關注現實世界，也同樣關注曾經與他同路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立身處世，並以榮利、節操的價值觀念加以評判。1951年5月24日（農曆四月十九日）記：“昨《人民日報》載侯仁之一文，謂參觀土改從農民學到階級鬥爭的恨與愛，此正今後知識分子應走之方向。侯生一語破的，應受上賞也！何以他人皆不能從此處着想，或有授意耶！”1956年2月29日（農曆正月十八日）記：

昨報載：楊樹達年初二死矣，遂得著名語言學家之諡。……予初印《骨董瑣記》有詆葉麻語，楊之師也。予嘗笑楊心目中祇有《漢書補注》，遂避予若浼。葉不得其死，予為刪去《瑣記》中語。解放後，楊不復稱葉，何嘗非乖巧人耶。

1956年8月18日（農曆七月十三日）記：“周（一良）自入黨後，已絕迹吾門。”1957年3月26日（農曆二月二十五日）記：“報載：馮友蘭所撰《魏默深百年紀念》，竟以魏為哲學家，謂若生今日必歡忻鼓舞，知言哉！舊學已亡，不勝浩歎。”8月24日（農曆七月二十九日）訪李仲

公^①，因為“談不治”，鄧之誠議論說：“此人似當得一新位置，老不忘官，如此者比比，不足異也。”1959年6月6日（農曆五月初一日）記：

報載：馮友蘭新著《四十年回顧》一書，當然為摹仿《梅蘭芳五十年舞臺經驗》而作。梅從學戲時說起，故可以五十年為題。馮公畢業距今不到四十年，學生時代亦須回顧，何妨從初生說起，改題六十年，豈不駕乎梅蘭芳之上哉？

1959年6月11日（農曆五月初六日）記：“閱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不實不盡。力詆蔣介石，而又謂其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自成前卻。此書刊於己丑春，馮已逝去，其妻募人代筆，為馮吹噓，即不啻為己吹噓。”

在其時著名學者中，鄧之誠與陳垣最終因觀念不同、追求各異，由朋友而形同陌路，故私下裏對陳垣的批評也最為激烈。

鄧之誠與陳垣在民國年間交往頗密，在日記中有多處往還的記載。1939年12月31日（農曆冬月二十一日），鄧之誠專門入城，“為援庵作生，酒肴呼自西來順，共約費四十元”，並邀沈兼士、張亮丞、柴德廣、余季豫等作陪。1945年10月19日（農曆九月十四日）記：“晚，援庵來久談。”1947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十四日）記：“陳援庵、余遜、柴德廣來。”1949年4月14日（農曆三月十七日）記：“陳援庵、柴德廣來。”二十多天後（1949年5月11日），隨着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信》在《人民日報》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兩人的關係起了變化。

陳垣在公開信中說：“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們自由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說，祇有在這解放區裏才有真正的自由。”“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的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遠在美國的胡適（1891—1962）看到這封信後，疑慮參半，遂以《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信》予以回應。胡適斷言：“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為此，胡適還從用詞、用句、語法結構以及信文內容的不可信諸方面進行了考證。^②

陳垣寫給胡適的信，是新舊政權即將更替之際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個重要事件。它鮮明地表達了以陳垣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從舊營壘中分化出來，站在了新生政權一邊；而對於那些尚持懷疑觀望的知識分子，則不啻為一種指引。

對於陳垣和胡適來往信件交鋒一事，鄧之誠十分關注。1949年5月15日（農曆四月十八日）記曰：“借閱《解放日報》，所載陳援庵《與胡適之書》，承認以往治學方法錯誤，及對共產黨認識錯誤，勸胡適改正。”1950年3月6日（農曆正月十八日）又記：“今日（蕭）正誼說：……胡適曾聲明陳援庵致彼書，非陳所作，以日月差互及白話用字為據，全猜錯了，考據之不足靠如此。然陳正以為得計，而胡乃指為贗作……奈何！”

新中國建立後，陳垣積極投身於思想改造以及各項運動中，鄧之誠與他關係日漸疏遠，並在日記中的記載日益增多，且多有揶揄、譏諷。1950年5月28日（農曆四月十二日）記：“陳援庵已穿藍布制服，妙極。”8月6日（農曆六月二十三日）又記：“孫錚來，言在清華開教職員工

① 李仲公（1890—1978），原名李其荃，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立法院立法委員等職務，是國民黨要員中著名的詩人、書法家。新中國建立後，曾擔任政務院參事、國務院參事。1968年3月，上交了兩封1927年賀龍寫給蔣介石的“求降信”，對賀龍專案起了材料佐證作用。

② 據陳垣弟子劉乃和的胞弟，也是陳垣在輔仁大學的學生劉乃崇披露，這封信雖由他人代筆，但確是出於陳垣的本意〔劉乃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會，即住會中，會期十日，星期三畢會。陳援庵日日往來，亦良苦矣。”1951年5月17日（農曆四月十二日）記：“閱報，昨日天橋控訴所謂三霸一虎者。……聞陳援庵首先起立發言：一、慰問受害者；二、槍斃三霸一虎；三、捉蔣介石惡霸；四、捉美帝惡霸。每發一語，掌聲雷動，繼連呼五種萬歲，愈呼聲愈高，至於嘶不成聲。”1952年10月4日（農曆八月十六日）記：“今日北京大學行開學典禮。從此，燕京成爲歷史名詞矣，陳援庵在來賓之列，最得意者也。”1954年11月9日（農曆十月十一日）記：“同舍來饋香煙，蓋爲明日賤辰。言去年曾訪陳垣，陳自謂如早死數年，人亦不過曰陳垣、王國維而已，如此自負。”1955年5月27日（農曆四月初六日）記：“陳垣罵胡風，以胡風黨羽在師大教書，不能不罵也。險哉！幾被拖累。”1955年12月30日（農曆冬月十七日）記：“得見陳援庵《佛教史籍概論》。此君大驚小怪，滿身火氣，宜服清涼散也。”1957年1月11日（農曆臘月十一日）記：“前數日《光明日報》載有《訪問陳垣記》，尊爲學人，榮哉！”1957年10月11日（農曆閏八月十八日）記：“同舍來，言：今日科學院在西郊賓館開會，到者二百餘人。午前由向達、榮孟源、陳夢家作檢討，午後發言批評。陳援自稱與向達劃清界限，又稱雖年老而有志學習馬列主義。蓋向達獨稱道陳援，以與陳寅恪同稱‘二陳’。陳寅恪曾公然要求不學馬列，故陳援不得不分辯也。”1959年3月12日（農曆二月初四日）記：“報載：陳垣《黨給我的新生命》一文，自述軍閥時代，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我所知者，民初，陳爲梁士詒私人秘書，衆議院議員。辛酉，梁組閣，得爲教育次長代部，後復攜貳，以居間買東坡《書髓帖》，通好於徐世昌，無所遇，乃投曹琨賄選票，得八千金。後與李石曾、馬衡合謀說馮玉祥逐宣統出宮，事後懼禍，避居大連半年。羅馬教皇納英欽之之議，設輔仁大學於北京，英推張相文爲校長，張力讓陳爲之。北伐成功，得李石曾之力，爲北平圖書館委員會長。辛未，專任哈佛燕京社學侶時，託陳振先向蔣中正‘輸誠’，竟無所遇，乃喟然歎曰：最後一條戰綫，祇有輔仁大學矣！翌年，乃謀回任輔仁大學校長，以至解放。今以諸葛自比，未免太不倫類！”

對於鄧之誠私下裏的揶揄與批評，陳垣雖然也有所耳聞，但始終採取的是息事寧人的態度。1955年3月2日（農曆二月初九日），鄧之誠在日記中記道：“李陶欽來，言：陳援庵言予喜雌黃人，令彼害怕，蓋欲借李達此語，令勿言彼事也。”一些研究者以文人相輕或文人意氣來解釋鄧之誠與陳垣的交惡，但更要看到，這裏還隱含着一種由傳統綱常名教化育而成的堅守、迂執及其所關聯的文化精神。

五

秉持這種文化精神的，並非僅有鄧之誠個案，在南方知名學者中，還有人們熟悉的陳寅恪。因此，兩人在精神層面上往往相與呼應。

1946年7月，王鍾翰來信言及陳寅恪將回北京。7月19日（農曆六月二十一日），鄧之誠“復鍾翰”，“言我對陳寅恪盼其來此，多一可談之友，蓋鍾翰以此爲問也”。1948年11月7日（農曆十月初七日），鄧之誠訪陳寅恪，在日記中用“極爲倒屣”來形容陳寅恪對他的熱忱歡迎。1954年11月25日（農曆冬月初一日）在日記中記曰：“《歷史研究》第五期，篇篇皆新派也，求如陳寅恪之文，亦不可得而見矣！”1958年，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正遭受厄運。鄧之誠對有關消息密切關注；6月22日（農曆五月初六日），他從聶崇岐（1903—1962）處得知：“北大史（系）正在批評陳寅恪影響，係專對周一良、汪篋二人。”遂在日記中分析：

周受知，汪受業也。乃悟前日報載《郭沫若與北大學生書》言：“陳寅恪掌握史料甚多，須勝過他。”蓋與此相呼應，而面面俱到。《詩》云：“巧言爲流，俾躬處休。”斯之謂歟！

7月4日（農曆五月十八日）記：“晚，同舍來，言：北大史系正根據馬列主義批評陳寅恪著述。”三天後又記：“姚嘉績來，言：歷史二所正在對陳寅恪《隋唐史》中所謂婚姻集團等荒謬

見解作批評，實老老運恐不佳也。”擔憂之情溢於言表。1959年11月19日（農曆十月十九日）記：“得王鍾翰昨日來書云：正大雪，陳寅恪託人告彼，鄭重向我問候。必見中華整理古籍消息，而後有此也。陳現掛名廣州科學分院副院長，去年批判二次。”陳寅恪的“鄭重問候”，當是對鄧之誠擔憂的回應。

當然，鄧之誠與陳寅恪的關係不限於此，兩人在精神層面上的相通還有諸多表現。

陳寅恪尊崇儒家綱常主義，其名言曰：“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鄧之誠對作為文化符號的“君上”，也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1938年8月28日（農曆閏七月初三）記曰：“凡事關君上，總不宜輕涉議論，形之筆墨尤為不可。”此時離辛亥革命已經有二十七年。1943年4月9日（農曆三月初五日）記曰：“閱高樹《金鑾密記》，除言德宗幽囚欲逃及賽金花事不足置信外，餘尚間有可採，唯歸過君親，語傷忠厚，決其人必非端士。”1954年10月30日（農曆十月初四日）記曰：“同舍（聶崇岐）以傳鈔本文廷式《聞塵偶記》見示，不及二萬字，所記無甚關鍵，唯未醜詆慈禧，尚為可取。”

陳寅恪關注明清鼎革之際的士人去就，晚年著成《柳如是別傳》。1961年，吳宓到廣州會見陳寅恪，“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吳宓在日記中記載他的印象說：“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趣之行動也。”此番意思其實可見於陳寅恪為《柳如是別傳》所寫的序言。陳寅恪說：“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缺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其心思昭然可見。而鄧之誠早在1930年便為日本橋川醉軒所得舊本《柳如是事輯》作序，該書大旨，亦頌揚柳如是之氣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不謂予巾幗中見之，殆釋氏所云‘青泥蓮花’者歟，烏得以衍衍瑣實而少之。爰搜輯遺事，以諷世之鬚眉。”^①鄧之誠以為：“讀是書者，亦善觀之斯可也。”^②中歲以後，鄧之誠又竭盡心力，著《清詩紀事初編》，着力發掘遺民詩人之事蹟與精神。兩人所關注之焦點，皆為江山易代時的知識分子與人格心態。兩人歷史書寫之真意，則不約而同指向“貶斥勢利，尊崇氣節”。

陳寅恪為學，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作《答北客》，有詩句云：“不採蘋花即自由。”1961年，作《失題》曰：“折腰為米究如何？折斷牛腰米未多。還是北窗高臥好，枕邊吹送楚狂歌。”1964年，作《贈蔣秉南序》謂：“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鄧之誠自1935年就宣稱：“生平淡於榮利，少無宦情”，“志在山林”。在其後的生涯中，他不僅在民國政府治下、日本佔領北平期間，採取了一種不合作、不參與立場，而且1949年後，也是“不求聞達”、遠離政治，其行為方式與陳寅恪若合符節。^③

陳寅恪性格孤傲，崇尚獨立人格，尤為反感學者做趨時附勢的“蒜頭搗”^④。他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指出：每當社會發生巨大變動之際，士大夫便會出現劇烈分化，“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其故在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新道德標準與新社會風習“以應付此環境而

①② 鄧之誠：《桑園讀書志》（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12、113頁。

③ 陳寅恪對開會學習以及政治運動也十分抵觸。因為目盲，除了上課基本不參加其他活動，因此被指為“以年老多病為藉口，逃避政治運動”（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第728頁）。

④ 1953年，陳寅恪作《詠黃藤手杖》詩云：“摩挲勁節間，煩優為一掃。……鑿地便冥行，倖免一邊倒。……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其餘如1951年《經史》、《文章》，1952年《男旦》、《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呂步舒》，1953年月食詩，皆有闡此主旨。

已”。^①1951年，陳寅恪作詩《文章》，揶揄包括陳垣在內的一些學者放棄傳統研究方法而專寫入時文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詩中“白頭”二字，典出《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八所記王直方《詩話》：“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白頭。”詩成後，陳寅恪寄給周一良，請他轉給鄧之誠，鄧之誠一眼就看出了詩中的要害，對周一良說：“這是陳先生的謗詩啊。”^②

作為精神上的“同道”，鄧之誠與陳寅恪有着相得相似的一面，但兩人遠非心靈上的“知己”，其對陳寅恪的不以為然在日記中多有流露。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鄧之誠不甚欣賞陳寅恪的詩文與史學。如1953年3月31日（農曆二月十七日）記：“孫楷第來，言陳寅恪有詩云：‘國脈消沉史亦亡，簡編臚書恣雌黃。著書縱有陽秋筆，那得名山淚萬行！’云譏五湖公，詩甚不佳。”（此詩題為《題洗玉清教授修史圖》，原詩共三首，此為其二。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載此詩，字句稍有不同，作“國魄銷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著書縱具陽秋筆，那有名山淚萬行。”“五湖公”是指范文瀾。）1953年11月8日（農曆十月初二日）記：“傍晚，周一良來，致陳寅恪謗詩，打油腔也。”1955年2月15日（農曆正月二十三日）記：“同舍來，偶及二陳優劣，言：贛陳優於粵陳。問朱寶昌，亦云然。此何可使粵陳聞之？予謂兩人有學與否，姑不論，而非史學則可斷言，然必以史自居，吾未如之何也已。”其二，鄧之誠對其時擬議中的陳寅恪北歸語加譏諷。1953年11月10日（農曆十月初四日）記：“同舍（聶崇岐）來，言：城中將成立上古史研究所，所長由郭沫若自兼，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屬意陳寅恪。然則陳君何必吟謗詩乎！”此處所說的“謗詩”即陳請周一良帶來的《文章》。1953年12月21日（農曆冬月十六日）記：“得洗玉清書，言：陳寅恪為國家爭獨立，為學習爭自由，故不應科學院之聘。此何說歟？”1954年9月29日（農曆九月初三日）記：“約同舍閑談，言陳寅恪又將北來，為研究員，不為所長，約法三章：不談馬列；為學不受限制；為文不得刪易，已得周總理允許。所謂鬱陶，然後有忸怩歟！”其三，鄧之誠對陳寅恪的《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不能理解。1953年11月28日（農曆十月二十二日）記：“得洗玉清書，言：陳寅恪正考《再生緣》作者，此有何關係？”1956年7月3日（農曆五月二十五日）記：“劉節先生來，言：陳寅恪去年研究《再生緣》，頃正研究柳如是，異矣！”1956年10月3日（農曆八月二十九日）記：“得瑞書，言：陳寅恪正在研究柳如是。可笑。”這些不以為然甚至譏嘲，或出於學術觀念之分歧，或出於理解之隔膜，或出於文人舊習，其間甚至不乏誅心之論，容另文展開。

①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第85頁。

② 卞僧慧 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269頁載周一良回憶：“陳先生寄給我幾首詩，囑我轉呈鄧文如先生。記得其中有一九五一年‘八股文章試帖詩’一首。鄧先生看後笑着對我說：‘這是陳先生的謗詩啊。’《鄧之誠日記》亦有關於此事的記載。